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 能消减国际冲突吗？

庄宗明 蔡洁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注重从国际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特别是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探讨影响和制约国际和平的种种因素;“相互依赖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的观点随之广为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净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评述了国外学者在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关系方面的观点、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虽然对经济相互依赖的衡量存在分歧,导致结论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证明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的观点。

一、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影响

对于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贸易消减冲突促进和平;(2)贸易既可能导致冲突,又可能消减冲突,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条件;(3)贸易增加冲突;(4)贸易与冲突没有关系。由于一些基础概念、理论和数据使用的差异,学者们对国际贸易影响国际冲突的结论不统一。中国学者曾对该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做过评述(邝艳湘,2007)。

早期的关于贸易对国际冲突的研究并非分析贸易对国际冲突的直接影响,而是从国际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Angell, 1913; Selfridge, 1918; Viner, 1937)。该学派认为,贸易能缓和经济与社会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90年代苏联的解体使对贸易—冲突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视角,大家所关注的主要是贸易和国际冲突间直接的关系。支持贸易对国际冲突有消减作用的学者认为,贸易之所以对国际冲突有减缓作用,是因为:第一,贸易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提高了贸易参与国的整体财富水平,而冲突会中断贸易导致经济损失,因此冲突的机会成本提高,国家不会轻易选择冲突战略(Polachek, 1980/1999; Rosecrance, 1986/2000; Han Dorrussen, 2006; Valentin L. Krustev, 2006);第二,贸易可促进国家间信息的交流,从而避免了国家间由于信息不充分而爆发战争。两国间若信息对称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当两国有了利益冲突的苗头时,可用贸易来传递信息而不用通过政治谈判甚至付

诸武力(Arthur A. Stein, 2003);第三,贸易会削弱国家间的敌意(Süheyla Üzyildirim and Nur Bilge Criss, 2001)。经济领域的合作机制可以扩展和外溢到其他领域,使合作领域扩大、层次提高。在不断加强和深化的合作中,有可能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确立共同的利益预期和规范,从而改变贸易伙伴国的态度和观念,使它们发展成为“安全共同体”,从而实现国家间的和平(K. Shitwongse, 1998);第四,贸易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国家的内部经济乃至政治制度和政治联盟,从而影响国家决策。当贸易部门的力量占上风时,他们会促使国家采用和平而非冲突战略(Geral Schneide & Günther G. Schulze, 2003)。

有些学者认为贸易对冲突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条件。Hirschman(1945,1980)在二战后就研究了“互惠贸易对依赖和主导权的影响”,他通过强调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负面作用证明了贸易的影响力,并发现不对称贸易关系在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Grieco(1988)在Waltz(1979)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利益论”,评估了贸易伙伴间合作的可能性。Barbieri也认为,对称的相互依赖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Barbieri, 1996)。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注重强调经济相互依赖是否对称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苏长河,1998;梅然,1998)。

持贸易增长会引发冲突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贸易可间接地引发冲突,由于国家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军事实力,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贸易增长产生的国家力量变化及权力转移会引起冲突(Mearshimer, 1990)。另一方面,贸易本身也可能

产生冲突。随着贸易的增加,国家之间的接触面也因此扩大,诸多经济争端会随之出现(Waltz, 1979)。

还有学者认为贸易和平论和贸易冲突论都忽略了贸易可能同时产生合作与冲突的可能性,主张贸易和冲突之间没有系统的逻辑联系(Copeland, 1996)。

学者们用于证明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影响的早期理论模型是预期效用模型,该模型基于“贸易促进和平”的假定,分析的前提是破坏贸易是有成本的。Polachek(1980)认为,好战的代价会潜在地增加贸易的价格。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越高,对冲突的需求越低。这种成本收益分析使 Polachek 得出结论,即相互依赖越高的国家发生冲突的倾向性越低。当冲突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同时,一国达到冲突的最优水平。预期效用模型提供了一个贸易促进和平的假说,但忽略了国家间战略相互依赖的联系。而且这种分析框架没有区分不同级别和不同种类的冲突,这与用分级的标准衡量事件数据的方法不符。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用合作博弈模型来解释贸易和冲突的关系,这个模型最初由 Grieco (1988,1990)创建。他认为一国的效用函数应不仅包括本国的收益,还应包括本国与它的伙伴间收益的差距。Grieco 强调,将相对收益纳入长期分析克服了在短期存在的合作收益分配问题。由于国家会获得合作产生的外部性,于是避免了长期中国家间收益分配不均。不过, Grieco 建立的博弈没有注意到模型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差别,仅仅在“冲突”和“合作”中做选择是不准确的。另一些学者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弥补了合作博弈中的缺陷。20 世纪 90 年代初, Powell (1991)用马可夫完美均衡来推翻 Grieco 的观点时,开始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进行该项研究。在 Powell(1991)构建的简单最优关税模型中,国家有三个选择,包括了拒绝与另一国正面冲突的行为,这在传统的两国博弈中是被忽略的。Morrow(1997)的模型强调了利益的分配,并加强了对国家间关系的考虑。Morrow 的研究说明,敌对国家间的贸易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存在的,但由于情形的复杂性,模型与他所说的框架不符。这种方法分析得到的贸易与冲突的关系有局限性。

关于国际贸易—国际冲突关系的经验分析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对贸易和冲突的测量方法不同,对控制变量的采用不同,使得结果存在争议。最早的经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贸易和战争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早期的研究被认为没有后期的经验分析可靠。因为早期的学者们没有控制一些与贸易和冲突都相关的易混淆的变量。其后的大多数研究纳入了其他控制变量。Polachek(1980)的双边分析给后来的贸易—冲突研究提供了依据。他揭示了贸易和冲突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的研究对象只是几个有限的国家间关系,这使人们对贸易消减冲突的普适性产生怀疑。Gasirowski(1986)对 Polachek 的研究提出反对意见,他提出另一种度量冲突的方法来解决数据中的问题,并改进了度量相互依赖的方法。他得到的结论是,贸易的有利方面会促进和平,但贸易的不利方面会增加冲突。Barbieri(1995)发现,相互依赖的不同侧面对冲突有不同的影响。Barbieri(1995,1996,1997,1998)的研究集中在贸易对最高烈度的冲突—军事争端和战争的影响。她尝试着将不

同种类的关系纳入研究,她假定贸易对冲突作用的差别产生于贸易关系是对称的和不对称的两种情况。在贸易关系不对称时,不论冲突表现为一般争端还是战争,贸易与冲突都有正相关关系。而在贸易关系对称时,贸易能消减冲突(Barbieri, 1998; Rosecrance, 1986; Domke, 1988)。Oneal 等人(Oneal and Ray, 1997; Oneal and Russett, 1997, 1999; Oneal et al., 1996; Russett et al., 1998)用多阶段的分析方法研究贸易和军事争端间的关系。同 Barbieri 一样, Oneal 和 Russett 着重研究贸易和军事冲突间的联系。与 Barbieri 不同的是,他们将贸易纳入更宽泛的研究框架中(Russett et al., 1998)。他们的结论是,贸易和冲突是负相关的。Oneal 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比前人的进步表现在,他们改善了数据和量度方法,扩展了基本模型,采用了新的统计方法。他们后期的研究采用了离散因变量模型中的当期相互依赖作为因变量。但他们没有具体证明贸易对冲突的影响。

由于选用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指标不同,不同的国家报告的双边贸易值不同,处理缺失数据的方法不同,因此,即使学者研究的是同一时期同样的国家,相互依赖的指数都有可能不同。这可能是导致贸易—冲突文献中结论差异的重要原因。另外,官方贸易数据是否是衡量交易量的准确指标也是一个问题(Yeats, 1990)。在某些情况下,贸易额本身并不能反映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或一国的经济状况。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学者们开始研究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学者们分为两派,分别认为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有影响和没有影响。支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假定跨国公司是一国与另一国抗衡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跨国公司从属于投资国,而投资国是国际系统中的核心行为者(Hymer, 1960, 1976; Cox, 1987; Gunder Frank, 1969),跨国公司的 FDI 与其投资国的对外政策间存在某种联系,因此 FDI 会影响国际冲突的发生(Vernon, 1971; Gilpin, 1975, 2001; Nye, 1974)。由于 FDI 具有贸易所不具备的特质,因此它能比贸易更有效地减少国家间冲突(Polachek, et al., 200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系统之间没有关系。跨国公司在国际系统中越来越成为独立的行为者,他们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削弱了国家的地位。Ohmae(1990)认为,跨国公司的 FDI 和一国投资政策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也不会对国家冲突产生影响。这是由于 Ohmae 过于强调跨国公司的独立性造成的,他认为不存在某个国家的公司,而只有在某个国家经营的公司,跨国公司不受国界的限制。

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冲突有消减作用的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 FDI 给国家提供信息,使国家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来阻止冲突的发生(Fearon 1995; Gartzke, Li, and Boehmer 2001; Hoon Lee, 2005)。Brooks(1999)认为 FDI 使信息透明化,改变了国家参与冲突的意愿。国家靠跨国公司提供的信息可以获得外部资源和供给,而不必靠参与冲突去获取信息,因此发起冲突的意愿减

小。Gartzke, Li 和 Boehmer(2001)提出,经济依赖会促使国家参与信息的交换,国际直接投资是信息交换的媒介,它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这个引发冲突的重要因素的影响。信息的公开透明减少了国家对军备竞赛的需求,从而促进和平(Fearon,1995)。

第二,FDI 增加了冲突的机会成本,因此会激励国家采用和平的对外政策(Rosecrance, 1999)。冲突减少了潜在的收益,导致投资损失。因为冲突导致风险,投资者会分外关注冲突的发生或潜在威胁(Robock,1971; Simon,1982; Wells,1998)。比如,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表现在:生产场所会被破坏,雇佣工人会受伤或遇害(Haendel,1979; Robock,1971);生产会因工人漂泊不定或生产的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中断;市场的作用会被打乱,使计划产生不确定性(Howell,1992; Agtmael,1976; Kobrin,1982);同时,政局受战争影响而变化从而加剧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冲突导致的高风险及国际直接投资中断的损失使东道国不愿陷入冲突之中。对投资国来说,跨国公司投资于外国是因为它们想获得更高的利润,预期收益越高,一国就越希望对外投资。而投资的收益取决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等因素(Agarwal,1980; Schneider and Frey,1985)。如果一个市场冲突频发,则不确定性加大,预期收益低。因此投资国也不愿发生冲突。于是,东道国和投资国都会更依赖与贸易、直接投资相关的国际商务活动,而不是去选择发生冲突(Russett & Oneal, 2001)。

第三,FDI 提供了除占领国家外能获取资源和财富的另一种方式(Brooks,1999; Souva,2001; Souva and Prins,2006)。Souva(2002)研究了近 30 年来 FDI 的增长后提出,FDI 是一国从别国获取财富的方式。FDI 通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流入来增加一国的财富,于是国家领导人会乐于促进 FDI 的发展,这是 FDI 促进资本和技术的福利影响(Johnson,1970)。FDI 使一国从另一国获得土地、劳动力、生产原材料等资源,并赚得财富。相比之下,冲突的风险大而收益却不一定。于是 FDI 减少了冲突的预期收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FDI 成为了征服、占领之外能获取资源的一种方式,它的收益替代了冲突的收益。

从以上观点可看出,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消减的方式与国际贸易类似。但国际直接投资受国际冲突的影响更大,因而冲突中断 FDI 所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

目前用于研究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理论模型是将预期效用模型和博弈模型结合起来并进行延伸(Polachek, et al, 2005)。此时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一个是东道国,一个是投资国。与贸易不同的是,此时考虑的是两个国家的效用函数。福利是消费和冲突的函数,投资的回报取决于资本和投资回报率,投资国的收入取决于投资国的工资和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收入征税的税率。在博弈部分,第一阶段跨国公司决定如何在投资国和东道国间分配投资组合,而东道国政府决定对外资的税率。在第二阶段,每个国家的政府决定与他国的国际关系的类型,即选择冲突的级别。这两个阶段的博弈进行循环。在投资国和东道国效用都最大化的情况下,存在 FDI 时冲突的最优水平比不存在 FDI 时要低。因此 Polachek 等人的结论是,FDI 促进了国际冲突的减少。但该理论模型还没有很好地突

出 FDI 区别于贸易的独特特性,因此也无法显现出 FDI 比贸易有更强的消减冲突的作用。

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影响方面国外学者注重的是实证研究。Margit Bussmann 和 Hans Wild(2004)认为,一个国家会希望避开政治风险,尤其是军事争端形式的政治风险,以免投资者不愿投资。他们用 1980—2000 年的数据检验了当经济相互依赖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形式时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们将长期直接投资和短期投资的数据代入双边冲突模型。结论是,国际投资能防止国家陷入冲突之中,和平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能更好地发展。但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这使模型存在内生性。因为不仅是直接投资会对冲突产生影响,冲突对直接投资也会产生影响。冲突导致投资环境变化,影响投资者信心和投资决策。Hoon Lee (2005)选取 1970—2000 年 70930 个双边事件用离散因变量模型估计了 FDI 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对方程进行多次修正,得到的结果也是 FDI 对国际冲突有消减作用。但他的模型同样也存在内生性问题。Polachek 等人 (Polachek, et al, 2005)用 FDI 的数据、VRA 数据(Virtual Research Associate)以及与战争有关数据库 (correlates of war 2) 的数据做实证研究,发现 FDI 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与贸易相似。他们采用的是联立方程组的方法。他们的结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FDI 的流入减少了国际冲突的程度并增强了合作。同时,由于国际冲突的减少、壁垒的降低,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大量增加。从实证研究看来,学者们检验得出的结果比较一致,都赞同直接投资会消减国际冲突的观点。

三、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共同影响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共同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在已有的研究中,Russett 和 Oneal(2001)认为贸易和 FDI 是替代关系,FDI 的增加会导致贸易对国际冲突作用的降低。但也有学者提出,贸易和直接投资会呈互补式促进国际冲突的消减,而不是相互替代抵消对方对冲突的消减作用。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FDI 对贸易具有补充作用。贸易要面对因相对收益不均而引起的潜在冲突,而 FDI 面临的相对收益问题比贸易要小。FDI 对投资国和东道国都有利,可以促进两国关系。跨国公司兼并购联合外国的生产设备,并不一定意味着本国的生产能力减少。在某些情况下,投资活动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生产与就业。投资国处于生产、销售和分配环节的“上游”,其最终价值增加得更多(Garrett,1998)。跨国公司在外国生产的增加和东道国经济的增长都是投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直接投资的这种双赢效应促进了国家合作政策的形成,所以国家间不会由于相对收益爆发冲突。蒙代尔(1957)提出了 FDI 补充贸易的另一个原因。他分析,如果一国对资本密集型的货物进口征税,那么它的国内价格的上升导致国内相关的资本和劳务价格上升。尽管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由于关税而减少,但外国的资本会以比它在投资国更高的回报流入国内。因此国家间贸易的减少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可以由两国

居民的资本交易抵消。

其次,FDI对贸易有特殊的贡献。Spero和Hart(2003)认为,FDI流量的增加与贸易的增加有关,FDI不但不会替代贸易,相反,它还会促进贸易的发展。虽然跨国公司对海外生产设备的投资服务于国外市场,但一些海外投资刺激了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的需求。比如,1988年日本投资在美国的公司从日本的母公司买走的商品量占了总进口的五分之四,对同类子公司的出口占了总出口的五分之三。同年,美国母公司和美国所属的国外分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了美国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二,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Encarnation, 1992)。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比较多,但是二者如何综合作用于国际冲突的理论模型还没有。不过我们从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受到一定启发。Markuson等(1983)利用一系列极度简化的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是由于Markuson等的模型过于简化,因此其结论缺乏一般性。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理论模型可以结合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在传统的预期效用模型和博弈模型上进行扩展。

Polachek等人(Polachek, et.al, 2005,2006)对贸易和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共同影响进行过实证研究。他们先建立两个联立方程组,分别放入贸易和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发现贸易和直接投资在促进和平消减冲突方面有着相似的作用。然后他们又建立单方程将贸易、直接投资同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对国际冲突的研究中。因为贸易和FDI相关性强,若都作为内生变量放入联立方程组则方程很难定义,因此他们建立的是单方程。结果发现,贸易和FDI同时增加净合作,它们之间的确是互补的。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既然贸易和FDI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那么即使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单方程也会存在较强共线性。

四、评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和直接投资虽然对冲突存在一定引发作用,但总体来看,贸易和直接投资具有的消减冲突的影响更强。贸易和直接投资可替代国际冲突以更安全的方式获取收益,贸易和直接投资可获得通过冲突得到的收益,并且风险远低于发起冲突,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促进信息交流制约国际冲突的发生,两国间由于缺乏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无法对对方的行为做出估计,容易发生冲突,而贸易和直接投资提供了沟通和协调的方法;贸易和直接投资可通过利益集团促使国家采取和平的对外政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利益集团会影响一国的国内政治,进而影响该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贸易和直接投资的交往可促进国家间在其他

领域的合作,合作的开展由最初追求经济利益到改变对彼此的态度和观念,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机制可产生外溢效应,使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

我们用亚洲国家和OECD的数据做实证研究表明,在不加任何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消减冲突、促进合作的净效应,另外,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两者对国际冲突的消减作用呈互补关系,相互促进消减国际冲突。当然,如果加上一些限制条件,贸易和直接投资消减冲突的作用可发挥得更好。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如何营造良好的多边环境成为各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不少潜在的冲突威胁,因此,研究贸易和直接投资对国家间冲突的净效应,从而有效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实现经济平稳有效地发展,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对于西方学者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言,中国学者尤其是经济领域学者们涉足这一领域还较少,因此,除了可采用不同的模型和数据验证国外学者的结论外,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中国的经济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第一,贸易、直接投资共同作用于国际冲突的理论模型还趋于空白。如何完善国际关系领域的模型,如何将贸易、直接投资的特性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模型结合起来,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第二,贸易、直接投资消减冲突的约束条件还需要做明确界定。按大多数学者的结论,贸易和直接投资都对国际冲突有消减作用,但它们并非能消减所有的冲突,因此这种消减作用是有约束条件的。中国学者可以对约束条件进行研究,或者清晰地界定此处国际冲突的概念。另外,贸易、直接投资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最好地发挥消减冲突的作用,这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虽有提及,比如在贸易对称时、存在贸易集团时、贸易品是战略商品时,等等,但研究还不深入,仍需作进一步探讨。第三,将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比如,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两岸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该理论是否能给东亚一体化提供政策上的指导,这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寻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